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卓克华 著

清代台湾 行郊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卓克华 著

清代台湾 行郊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台湾行郊研究/卓克华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ISBN 7-211-05346-1

I. 清... II. 卓... III. 商业—行业组织—研究—台湾省—清代 IV. F7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082 号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清代台湾行郊研究

QINGDAI TAIWAN HANGJIAO YANJIU

作 者: 卓克华

责任编辑: 吴锦通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4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211-05346-1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经君健 郑学檬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术界“悟诸未悟者”。但是更多的经济史学者，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遵循经济史学自身的规律，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各个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他们的工作，不仅为后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史料基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突破了“左”的、极“左”的思想禁锢，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迎来了学术界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主旋律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硕果累累，新人辈出。年长的学者老树开花，总结多年的积累，写出长期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中年学者思想成熟，精品迭出；特别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学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成绩，有厚望焉！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外史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中外学术文化、教育交流的频繁，老、中、青学者都以开放的、求实的态度吸收外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展。

在以上所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诞生了，一如雕龙跃笔海，彩凤栖文峰，令同行艳羡不已。这套丛书是百家争鸣的园地，是经济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施展才华的空间。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既有以实证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的扎实研究，也有逻辑严密、精辟深邃的理论探讨。希望这套丛书在学术上能做到兼收并蓄，并以多种风格的论著并存为特色，而严谨的学风则应该是丛书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青春去住随柳条，欲寄来人以为信。”祝贺“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并相信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精品文库，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2005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清代的行郊释义	(5)
第一节 中国行会沿革	(5)
第二节 行郊之起源与背景	(8)
第三节 郊名之取用及衍变	(13)
第四节 行郊分类	(30)
第三章 行郊之组织结构	(37)
第一节 组织规制及权责	(37)
第二节 会议商讨及会所	(44)
第三节 经费来源与开支	(46)
第四节 郊规订立及仲裁	(56)
第五节 组织结构之检讨	(59)
第四章 行郊之贸易营运	(63)
第一节 贸易地区及贩售货品	(63)
第二节 行销暨市场体系	(81)
第三节 郊行的营业与管理	(85)
第四节 交通运输工具	(88)
第五节 饷税关厘之稽征	(100)
第五章 行郊之组织功能	(109)
第一节 经济功能	(109)

第二节	宗教功能·····	(113)
第三节	文化功能·····	(122)
第四节	政治功能·····	(128)
第五节	社会功能·····	(143)
第六节	功能检讨·····	(165)
第六章	行郊之没落式微·····	(171)
第一节	港口淤塞机能丧失·····	(171)
第二节	列强经济势力入侵·····	(179)
第三节	内乱外患连绵不绝·····	(184)
第四节	航运风险税政赔累·····	(195)
第五节	刻薄巧诈败坏商誉·····	(201)
第六节	会员离心弊窦丛生·····	(205)
第七节	乙未割台局势顿变·····	(208)
第八节	余论暨检讨·····	(210)
第七章	个案研究之一——新竹行郊·····	(213)
第一节	前言·····	(213)
第二节	埤郊之成立及诸郊户考·····	(215)
第三节	埤郊之组织及贸易活动·····	(220)
第四节	市场交易及行销系统·····	(227)
第五节	埤郊衰微原因·····	(230)
第六节	埤郊对地方之贡献·····	(234)
第七节	结语·····	(239)
第八章	个案研究之二——澎湖行郊·····	(242)
第一节	引言·····	(242)
第二节	澎郊之成立年代·····	(243)
第三节	澎郊之组织体制·····	(245)
第四节	澎郊之经费收支·····	(247)

第五节	澎郊之郊规约章·····	(250)
第六节	澎郊之会议会所·····	(255)
第七节	知名郊铺与市肆·····	(257)
第八节	商船出人之港湾·····	(263)
第九节	行销货品与地区·····	(267)
第十节	贩运之交通工具·····	(272)
第十一节	澎郊衰微之原因·····	(277)
第十二节	澎郊对地方之贡献·····	(289)
第十三节	结语·····	(301)
第九章	综述与结论·····	(304)
附录一	试释全台首次发现艋舺“北郊新订抽分条约”···	(310)
附录二	澎湖台厦郊补阙·····	(327)
附录三	艋舺行郊初探·····	(352)
主要参考文献	·····	(362)

第一章 绪 论

台湾僻处海隅，梗于交通，开发较晚，初期经济，仅求自给自足，可归属自然经济阶段。至明天启初，荷人先据澎湖，继侵台湾，盘踞数载，虽有一二建设，实则榨取台民膏血，以搜括为能事。明郑光复故土，以为抗清基地，清廷为绝郑氏后援，于大陆沿岸厉行迁界移民政策，并严禁大陆沿海地区与台岛通商，使沿岸无数居民流离失所，致屡有冲破禁界偷渡来台者。而郑氏生聚教养，一面开拓耕地，一面发展对外贸易，结果农业生产急剧高升，台湾成为祖国大陆外销物质之集散中心，贸易渐趋兴盛。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领有台湾，海禁虽严，然偷渡者众，迨及康熙末季，冒险渡台垦拓者，几乎满布全台。嗣后闽粤沿海大批移民仍陆续来台，而于乾隆元年（1736）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达于最高潮。移民们大都从事土地开垦，而由于移民增多人口繁殖，垦地日广，不仅农民及农产随之增加，从祖国大陆运来销售各种货物之商人亦大量增加，工商百业随之蔚起。又由于农业生产之发达，商业贸易之日隆，祖国大陆商人移驻台湾，从事商业者之日愈殷盛，彼辈于岛内各港埠经营货物输出入，谋取赢利，并组织成一商业集团——“郊”。

台湾行郊之嚆矢，起于雍正初年之府城三郊——北郊、南郊、糖郊。乾隆四十九年（1784），台湾中部之鹿港获准与泉州

蚶江通航，鹿港商业亦趋繁荣，八郊遂兴。乾隆五十七年，开放八里坌港，准与福州之五虎门、蚶江往来，于是北部淡水日益繁荣，商船云集，阗阗鼎盛，而淡水河上游之艋舺，因水利交通之便，北部各郊行咸集该地，全台形成台南、鹿港、艋舺三地商业鼎立之局，俗称“一府二鹿三艋舺”。此后各地港埠，郊行林立，盛极一时，从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间，掌握台湾内外贸易大权者，悉在此种“郊商”。同治后，则因港湾淤塞，影响航运贸易，及外国资本之侵入，渐失势力而告式微，其潜在力量则直至日人占台后才告结束。

清领有台湾亘二百年，有清一代，台湾为海上交通要冲，农产发达，商业繁盛，行郊繁多，其势力殆可操纵全台，二百年之行郊史颇有可述者，惜史料湮灭殆尽，前之学者对此又少有研究，即使有一二人士研究，亦语焉不详，论断有待商榷，至我辈青年实已不知“郊”为何物。遂引起个人一探究竟之动机，期能于二百年之行郊史实有一了解。再则，中国为一广土众民之国家，各地资源生产不同，自古即有区域间之贸易活动，流通有无，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台湾为中国之一省，台民为中国之人，探讨台湾行郊史实，除能了解台湾与中国大陆之省区贸易外，并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之社会经济发展情形，此一比较探讨，或能侧面提供我国近代历史发展之所以异于西方社会，暨国势陵替之真正原因。

历史研究有赖史料与史观，无史料即无史学，台湾行郊为一民间组织，其层面涉及既广，史料琐碎零散，搜罗匪易，可供研究者亦复缺乏，可谓处处是史料，每每又不是史料。加上我国历代典籍记载，偏重于典章制度、学术思想、政治人物、开疆拓土等上层文化，于社会风尚、民间生活、经济发展、商业活动等下层文化少有记录。故有关行郊史料既阙且略，搜罗匪易，以今存

史料言，台湾诸方志及闽粤两省方志所载，或略而不言，或偶一提及，无一完整系统之叙述，反不若昔年祖国大陆宦游来台者之见闻著述，尚能稍详，惜亦语焉不详，含混不清。较为珍贵者，其一为台湾各地留存之清代碑碣，然而断碑残碣，所能参考运用者，多限于碑末之“捐输名单”；其二为日本殖民统治初期，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印之第一部调查第三回报告书之《台湾私法》第三卷及其《附录参考书》，此一调查报告，于郊之性质、组织、沿革有较完整解说，并收有“郊”之参考文献十数件，书内其他可供参考者，亦复不少，但多为日据初期者，已是行郊之尾声矣！以研究人士言，日人伊能嘉矩之《台湾文化志》，东嘉生之《台湾经济史研究》，已能较详叙及，唯二书之资料不出《台湾私法》一书，囿于史料缺略，固无可奈何。光复以还，台湾各县市修撰之方志，虽多有提及，却又不出《台湾文化志》与《台湾经济史研究》二书之范畴，了无新义，反不如台省一二地方耆宿之回忆撰述有价值。嗣后少有专门研究行郊者，有之，以方豪先生为昉，亦最有系统，发人未见，然已是四十年前之事矣！晚近则少有闻焉，偶有一二人士撰文提及，率杂抄方先生之文，又不翻检原书，其内容文字错误百出，良可叹惜。

有关行郊之史料既如此缺乏残略，故本书之研究撰写有诸多困难，须先作一说明：

（一）由于史料有缺，断简残篇，搜罗匪易，故本书撰写之原则为宁详勿略，宁烦勿简，是以宁失之厌烦，勿失之简略。

（二）又因史料缺略，故本书之撰写，不得不屈就史料，章节之编排，篇幅之多寡，均无法顾及条理井然、详略平衡，必有畸轻畸重，失当之处。

（三）文献史料既苦不足，复因原始材料之缺陷，本书无法以量化统计方式作一观察分析，仅能做到排比铺陈之叙述而已；

复次，史料不足，有赖史法辅助，故本书之撰写，借重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地理学等观念之处甚多，是以本书重点置于行郊之组织结构、组织功能，并兼及其贸易运销、郊名释义、没落原因、贡献影响等探讨。

要之，本书之撰写，因史料残散，疑信相参，其研究方法势不得不采用多法，故有比较，有辨识，有归纳，有商榷，有考证，既不故作惊人之论以标新立异，也不自囿锢限以抱残守缺，总期因事制宜，求其至当，则斯文之作，或有助于台湾社会经济史之研究。

第二章 清代的行郊释义

第一节 中国行会沿革

我国行会组织起源甚早，其组成原因有下列诸说：（一）以崇拜本行业之职业神所结合之宗教团体。（二）为垄断某一营业，以维持其共同利益，并加强其势力，以影响其他同业。（三）因人口过剩，谋生不易，已得职业者为求保卫其既得利益，乃组成团体。（四）为对抗官府加诸工商业者之横征苛索、不法压迫。（五）寄居客地商人，为谋互助联谊，因而同乡互相结合。（六）传统独占某手工业制品之家族，逐渐扩展而成。^①然上述家族制度、同乡团体、宗教团体、人口过剩、政府压迫等诸说，率皆为行会之结合手段或维持团结方法，非其组成原因。质言之，其根本原因乃由于都市中工商业高度发展及生产力增加之结果，引起同业间之激烈竞争，各职业为对内互助团结，对外防御竞争垄断，以谋共同利益，才组成各种行会。加以我国政府向采无为政

^① 详见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一章“行会的起源”，第1～12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12月再版。

治及轻商重农政策，少保障渠等利益，于是各职业者为求消极互保，各依种类、地区自由地组合，有时为加强团体，再以家族为本位或同乡为主体。

中国行会制度起源可远溯至周末，至汉代已具雏形，《史记·平准书》云：“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所谓“作”，殆即当时各手工业行会。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市西追酤、冶觞二里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南调音、乐律二里之人多丝竹讴歌；市北慈孝、奉终二里之人以卖棺槨、赁輶音为业。另有准财、金肆二里，多为富人所居，凡此十里多出工商货殖之民。是知南北朝时，各行业人员，已在都市中丛聚而居，足征行会组织已渐渐形成。^①至隋，始见“行”之名称。唐韦述之《两京新记》中，“行”名屡见，如“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又如“大业六年（610），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门市齐正，高低如一，环货充积，人物甚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云云。再如宋刘义庆《大业杂记》称“丰都市因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瓦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衢相注”。可知隋代洛阳各市内有不少“行”之存在。^②

到唐时，行会逐渐增加，同业之商店泰半组织成行，每行之家数亦同时激增。据唐人文献中所记诸行，时已有肉行、铁行、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卷四《城西·法云寺》，第142页，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1月。

② 详见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第29～43页。

太衣行、鞞簪行、秤行、绢行、药行等。^① 此种商店或称“行商”、“行人”及“行户”，设有“行头”或“行首”，为同行祭神及与官府交涉时之代表。诸行亦订定本行之物品质料格式等限制，唯此时多以同业商店所在街区称“行”，仍未具备一完整组织形态及制度。

行至宋代，因传统市制之崩溃，行之团结愈迫需要，组织乃愈盛，从而普及各地，种类日趋复杂，可类别为职业（如教学行、乞儿行）、手工业（如纸扇行、席帽行）、商业（如鲜鱼行、果子行），其中虽无严格之徒弟制度，却有势力范围之划分以独占营业。行内有“行头”或“行老”，常举行各种宗教或娱乐活动；行亦须接受官府要求，筹办所需物品，负担指定任务，是曰“行役”。要之，宋代行会制度已称完备。^②

元明以还，行会制度极为普遍，元曲及明人小说中屡屡提及，组织制度亦无重大改变。到清代，大小城市均有行会组织，有称“会”，有称“帮”，各垄断某一行业，以汉口为例，湖南帮经营茶、米；陕西帮经营牛油、牛皮、羊毛；山西帮经营票号等。各帮设有会馆（或称公所）作为办事之活动机关，率为同乡同业者所建，如宁波有洋布公所、咸货行公所、钱业公所、靛公所、缎业公所、糖公所、建帮会馆、木行会馆等。^③ 简言之，近代中国行会可分为同乡与同业两类，同业又可细分为商会、工会两种；依其性质，可分为公所（会馆）、业会、公行三种组织，公所多为商人结盟，业会为工人组合，公行则由行商主持。

① 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第 377 页。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台北华世出版社 1976 年 6 月译本初版。

② 同上注。

③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六章“会馆”，第 99 页。

如上所述，我国商业团体之称谓，有称会馆、公所、公会、商会，甚或单称为帮者，唯“郊”之称，仅见于闽南，如厦门之洋郊、北郊、匹头郊、茶郊等，^①而以台湾最盛。台湾之“郊”又曰“郊行”，亦作“行郊”，含有同业公会性质，其组织与祖国大陆之工商行会类似，其称谓之异，或因地方方言使用之歧异所造成，要之，皆源起我国唐宋时代之“行”制也。

第二节 行郊之起源与背景

台湾行郊之起源，固然可溯至唐宋时代之行制，亦可视之为大陆行会之流衍，然亦有其特殊之历史、社会、经济、地理、宗教等背景。

台湾在地理位置上，东临太平洋，西濒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相对，孤峙海中，幅员狭小，资源缺乏，有赖贸迁有无。幸交通位置优越，东北接琉球、日本，南通南洋诸岛，西与福建一衣带水，居亚洲东部大陆边缘之太平洋南北纵列岛弧之中点，地处祖国大陆与大洋相交切之处，为南北交通、东西辐辏之地。台湾位居海道要冲，能争取大宗收入者为对外贸易，故经济发展一直以市场为导向，为典型之海岛经济，简言之，台湾必须往海洋发展，拓展贸易，实为地理形势使然，此为台湾行郊起源之地理因素。

早在隋时，中国人已发现台湾，但大量移垦入台，则始于明末，然在未行垦殖前，台湾地区早为福建沿海商人负贩与渔民采捕之地，盖因闽地斥卤硗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大者为商

^① 参阅王一刚《台北三郊与台湾的郊行》，《台北文物》第6卷第1期，第12页，1957年9月。

贾，其次为捕鱼，以船舶为家者，十而九也。据近人曹永和先生之考证，早在明嘉靖、隆庆、万历之际，南起北港，北至淡水、鸡笼，大陆上已有许多商船和渔船成群结队进入台湾本岛通贩采捕，甚而假之为名，私贩倭国，已为常闻。^①至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荷人采取商业殖民主义，专以取得贸易上之利益为主，故其事业重点，即在与中、日两国贸易。其时台江沿岸一带，渐成商业中心，我国漳泉商贾，咸集于此，商业颇为隆盛，随其贸易之繁荣，西与闽粤，东与日本，南与爪哇，均有船舶往来。是以当时台湾已为祖国大陆货物之集散中心，形成对祖国大陆、日本及南洋等地之贸易要地。^②明郑复台，因袭荷旧，潜心于海外贸易之发展，而负责其业务者为五商。五商势力庞大，分山路五商与海路五商，山路五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设于杭州及其附近各地，收购各地特产输往厦门；海路五商为仁、义、礼、智、信五行，设于厦门及其附近，将大陆物资运销外洋。五商不仅负责大陆与外洋之贸易，亦拥有庞大商船，负责运输任务。^③是以明郑所经营者不仅限于祖国大陆、台湾之间贸易而已，且对日本、吕宋、暹罗、交趾进行贸易，甚至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西欧诸国亦有通商往来，成为远东海上贸易之霸，安平亦成为东洋贸易之要枢。^④故至清领台湾，台民有明

① 曹永和：《明郑台湾渔业志略》，第37页，收入《台湾经济史初集》，“台银研丛”第二五种，1954年9月。

② 《台湾省通志·经济志·商业篇》第三章“国内及国际贸易”第一节“荷西窃据时期”，第143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6月出版。

③ 南棣：《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台湾经济史》十集，第44页，“台银研丛”第九〇种。

④ 《台湾省通志·经济志·商业篇》第三章“国内及国际贸易”第二节“明郑时代”，第135页。